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困:挑战与应对^{〔*〕}

○ 谷贤林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受到全球化越来越多的挑战。这表现在:人才流失;本土文化被西方世界扭曲;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下降;实施促进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高等教育政策变得更加困难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对中国高等教育现行的目标、管理制度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进行变革,并尽快确立适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与参与模式。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

高等教育发展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与全球化相提并论,^{〔1〕}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不仅为中国高等教育融入全球学术体系提供了可能,也使中国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制度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加之,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都是无形的,这使中国高等教育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比有形的经济领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全球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

第一,人才流失。全球化时代,一样的电脑、一样的工业自动化设备、一样的航空运输和货物处置、一样的技术语言、一样的操作方法和程序,这些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精英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体系提供了条件与

作者简介:谷贤林(1965—),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10JJD880002)。

便利,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流失。根据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在美国的外籍学者中,中国人占18%,印度人占8%,俄罗斯人占2%,巴西人占1.5%。中国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中国留学生约占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20%左右,在美、英、日等几个接受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中,中国留学生数都名列第一。然而,中国滞留不归的学生也是最多的。从统计数据来看,2000年前出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在美留学博士大约47%选择留在美国,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滞留在美国的比例高达87%,这不但远高于我国台湾地区的57%,也大大高于韩国的39%和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的印度的82%。中国这种人才流失的局面,不仅在短期内难以扭转,反而还会因为全球化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结果是:(1)它使中国大量的前期教育投入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2)直接影响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消除了政策壁垒,刺激了低端劳动力的国内流动。如果没有全国化的人口流动,尤其是2亿农民工的流动与付出,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繁荣。然而,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人口红利的结束,我国要再发展只能依赖于人才与尖端技术。

第二,本土文化的扭曲和丧失。全球化的特点之一是市场的普遍化。不仅有形的物品可以被交易,无形的文化、服务、知识财富等也都成了自由贸易体制的组成部分。据统计,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不是它的计算机、汽车或飞机,而是它的电影或电视节目。^[2]好莱坞电影制作室的老板不仅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产品,还推销美国的文化及其价值观,^[3]影响人们的思维、追求和行为。另外,在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用英语发布的,其话语权也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结果正像有学者说的那样:互联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它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那样去思考、去写。^[4]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其实就是一种欧美化,或者说就是欧美文化独步发展中国家。而在一些西方的媒体上,对于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要么被曲解和误解,要么就被视为一种不适应全球化的文化。在经济非常落后时,我们被动挨打;而在摆脱了挨打、挨饿之后,全球化让我们受讥讽、挨骂。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学生成长的外部现实环境。

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理论、话语和叙事方式在其经济、军事、技术等硬实力的支撑下,像决堤后的洪水一样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倾泻。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分析中国问题既被认为是学术水平高的象征,也最能够获得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如学术刊物的认可及深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学生的认同。而对于西方没有提供理论或西方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如: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的集权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这种成功是阶段性的还是具有可持续性?这种模式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能够相互借鉴且并存吗?决定中国能够在20年内走完西方两百年发展历程的制度、政治、文化因素以及经验、教训是什么等等,这些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因为缺乏自身的知识体

系,中国学者同样也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见解。在全球化所追求的普遍性的夹击下,拥有自身特点的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和学者一起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扭曲了。这让中国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变得更加困难重重,让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努力没有了支撑点。但是,辨证地看,在另外一个向度上,全球化的普遍性与中国特性的激烈、频繁接触与冲撞,也可能有助于二者深度地互动与吸纳,使彼此更具有包容力。

第三,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下降。全球化的另一特点是,很多权力和影响力都来自于政府之外。全球化消解了国家的力量,也削弱了一些国家以前拥有的权力。这是因为:(1)资本、服务、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快速和自由流动,削弱了国家及政府在传统上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跨国贸易、国外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变得过于全球化,以至于国家几乎失去了控制资本流动的能力,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小,甚至成了决定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宰者;^[5](2)通讯、互联网等数字科技的发展,使时空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的区域。它超越了领土的管辖权限。这使国家的权力运作受到了太多政治空间以外力量的限制与制约;(3)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不断地冲击着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以我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世界银行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2-2002年,中国开展的高校合并,其理论依据就是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规模效益理论”。同样,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也有世界银行影响的影子。高等教育政策本是一国政府为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在权力范围内而制定和执行的规则、规范、制度或发展策略,但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很多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或政策议程的确立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而是通过超国家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定义、转换和传播而实现的……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6]

第四,增加了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和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难度。全球化的悖论还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人们更加热衷于寻求地方特色的意义和确定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世界的设施、饮食、城市景观都趋向一致,而各个国家和民族则极力维护自己在种族、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的个性,希望使之不受干扰。而且,全球化发展越快,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个性的维护与坚持也就越坚决。^[7]这使在争取国家独立的年代,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间形成的、和谐的民族关系出现了裂隙。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来说,国外政治势力的介入、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相互印证与强化,不仅增加了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难度,也让中国一些高等教育政策在施行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掣肘。“在全球时代,不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是不可能繁荣的。经济要繁荣,那就得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那就得融入全球化。”^[8]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中国的全球化也不可能仅是汉民族的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在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如何帮助

少数民族学生跨越文化边界,使他们融入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化中,而不被误解为是实施文化同化,等等,这些都对中国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目标、管理与参与模式

1. 调整高等教育目标。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目标成形于建国之后,几十年来,虽然在文字上有所调整,但中心思想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目标有三个显著的特点:(1)它延续和继承了建国前我党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精髓;(2)它是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国与国交往、相互依赖程度较低时代的产物;(3)人才培养的国内定向,或者说人才培养仅限于国内的要求。

全球化时代,组成当代世界体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多样化,使世界上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的影响。^[9]因此,无论是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还是从相互影响来说,继续把国内的要求作为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目标的唯一起点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应该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地位、所要担负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等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的要求来确立目标。

从国际地位来说,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联合国总部、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诸多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我国根据有关会员国的规定,都派出了相应编制的人员,但是,这些人员极少能够进入相关国际组织的决策层、领导层,基本上都是业务类的官员。这一情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甚相符,与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目标与课程体系的局限,导致中国培养的学生缺少国际视野,缺少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知识与技能。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目标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内,也应该立足于培养在全球化时代为世界服务的中国人。

从相互依赖与影响来说,长期以来,由于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中国一直立足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些世界性的议题,中国介入的并不多。但是,近年来中国逐渐接受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的界定,已经积极地投身于一系列的国际事务,而且,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应尽的义务、承担的责任将会越来越多。这也要求中国高等学校在知识供给、知识生产、研究领域、人才培养等方面与全球化相一致,突破国家的边界,把世界的边界作为自己的边界。能够提供一些引导全球发展的议程和价值观,并为全球科学发展提供范式。

2. 调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其核心观点是:(1)政府应该尽可能减小规模,实现最小化的理想状态;(2)市场不仅可以替代政府的职能,而且是比政府更好的选择,因为市场的绩效比政府好;(3)资源

的配置与使用应该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而国内市场的价格应该尽可能与国际市场的价格一致;(4)国家的政治目标、国民经济计划乃至国界都不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屏障。^[10]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切都由市场决定,国家的干预是不可取的。而从美国政府拯救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政策来看,这种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照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吸收一些合理的内核,除非我们以牺牲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而放弃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启迪在于: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新的“政府—市场—大学”三方协调、平衡与制约机制,以取代目前在“政府—大学”间形成的垂直体制,使高等学校既对政府负责,又对作为消费者的学生负责,同时拥有自主管理的权力。如果不引入市场力量,大学仍然摆脱不了政府的绝对控制;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市场又会将大学推向无序竞争的状态。这既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也会造成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因此,如何合理地使用与发挥市场的作用将成为全球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關鍵。

3. 完善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当前,中国呈建制参与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模式是孔子学院。其职能是:在秉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汉语的教学和推广、培训汉语教师、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等来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1]至2013年底,我国共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440所、孔子课堂646个。其中,建立在美、英、俄、法、德、韩、日、澳8国的孔子学院是218所、孔子课堂468个,分别占总数的一半及一半以上。而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及地缘外交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和价值的中亚、拉美、非洲,数量则明显不足。按照传播理论,一个国家语言和文化传播能力的强弱与这个国家硬实力的强弱紧密相关。强国在语言文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向外传播力,而弱国在文化传播力上则往往处于弱势。当前我国设立孔子学院与课程多的地方,恰恰是我国文化传播力弱的地方,而能够让我国文化产生事半功倍传播效果的地方,正好是孔子学院与课程设立少的地方。另外,从孔子学院与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除语言外,中国传统文化占有较大的比重。然而,从文化知识的流动来看,无论哪个国家,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是有选择性的,即自己缺什么选择什么,而不是对方给什么就要什么,或全部照搬。当一个国家处在落后状态时,最想从发达一方学到的并不是所谓的传统文化或价值观,而是富国强兵的知识与技术。因此,与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制造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在扩大中国影响力或软实力方面,其作用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与教育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它们从骨子里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中国的文化,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但这种关注,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并非源于对一种异质文明的尊重。除少数研究人员外,我们不可能指望对本民族历史传统都不是很了解的大众去关注另外一个民族遥远的文化。虽然传统文化能够让人产生好奇和神秘感,但这些并不代表它能够产生吸引力和

影响力。而在教育和文化方面落后于我们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更会选择其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现代科技知识。因此,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从与我国存在落差的发展中国家来看,真正能够提升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或软实力的都是具有现代气息、现代元素、现代符号的中国当代文化,而不太可能是我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这应当成为我们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化、到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时的基点。

三、余 论

正像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全球化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会愈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当前尤为紧迫的是要解决下列三个问题。一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通过控制教学内容来保证学生的思想认识符合社会要求,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大量开放式的网络课程的出现,这种方式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有限。如果继续讳疾忌医,不正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将会陷自己于不利甚至危险的境地;二是在应对全球化的方式上,目前中国高校普遍是各自为战,需要政府尽快制定高等教育全球化战略,明确中国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到底“要什么”、能够“给什么”,结束当前无序、混杂的状态;三是确立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化的模式。目前,发达国家采用的参与模式有:慕课、在其他国家开设分校、与其他国家高校合作建立相关的学术项目、签署多边协议允许学生和教师在不同的学术机构之间自由流动等。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这些方式虽然可以借鉴,但现阶段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派遣大量教师到国外,尤其是到落后于中国的国家或地区从事不同专业的教育工作,因为这既符合学术流动由高向低的规律,也可化整为零避免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文化扩张。

注释:

[1] Roberts Rhoads, Carlos Torres. *The University, State, and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meric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01.

[2] Keith M. Lewin:《顺应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变迁与改革》,《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3]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p. 32.

[4] 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引自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5][7] Joel Spring.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 145.

[6] 谷小燕:《探析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几种理论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

[8] 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 杨雪冬:《西方全球化理论:概念、热点和使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0] Deepak Nayyar:《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引自 Jacques Baudot等:《与地球重新签约: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11] 孔子学院,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2014-07-10.